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六編 第十六冊

出土文獻與《商君書》綜合研究(上)

全衛敏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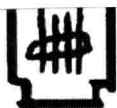
十六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16冊

出土文獻與《商君書》綜合研究(上)

全衛敏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出土文獻與《商君書》綜合研究（上）／全衛敏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2+18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第16冊）

ISBN：978-986-322-167-8（精裝）

1. 商君書 2. 研究考訂

011.08

102002356

ISBN-978-986-322-167-8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 第十六冊

ISBN：978-986-322-167-8

出土文獻與《商君書》綜合研究（上）

作 者 全衛敏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十六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出土文獻與《商君書》綜合研究（上）

全衛敏 著

作者簡介

全衛敏，女，1978年生，陝西戶縣人。1997年9月至2007年7月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先後獲得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主要從先秦史研究，現任職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提 要

《商君書》，亦名《商君》、《商子》，漢代傳世29篇，今實存24篇，內容涉及商鞅及其後法家人物關於治道的理論和措施等。縱觀前人對《商君書》的研究，一個迄今尚未合理解決的問題，即關於該書各篇的成書時代問題。另外，與多數子書不同，《商君書》各篇體例不純，既有關於個人或學派觀點之陳述，又有涉及政令、法規、制度者。因此，只有通過綜合研究我們才能對《商君書》的內容及性質有比較完整的認識。按照這一思路，全書分上、下編兩大部分。

上編主要探討商鞅和《商君書》的成書問題。第一章分析考察了商鞅生平的重要階段及學術淵源，力圖把握《商君書》的思想來源；第二章至第六章通過內、外考證相結合的方法對《商君書》的成書時代作分篇考證，得出的結論是：今本《商君書》中的《畫策》、《錯法》、《徠民》、《賞刑》、《慎法》、《弱民》等六篇成書分別在秦惠文王至秦昭王時期，是商鞅後學所作；《定分篇》成書最晚，約在秦始皇即位之初，作者疑為秦御史一類的官員；除此七篇外，其餘篇章集中反映了商鞅本人的思想，或出自商鞅之手，或為親聞商鞅之教的門人或私徒屬所作，或出自秦史官之手，被後人編入《商君書》中。因此，《商君書》基本上可以視為商鞅及其學派的著作。

下編分三章，探討《商君書》中的制度和思想。第一章採取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二重比較的方法，對《商君書》中所涉及田制、爵制等相關制度進行考證，力圖揭示該書各篇作者如何應對時勢、如何化思想為制度，最終推動秦的統一進程。第二、三章主要分析《商君書》的思想，具體包括五個方面：《商君書》的理論基礎是變易的歷史觀和人性論，「尚公」和國家本位是全書政治思想的主要特點，商鞅重法，但《商君書》對「勢」和「術」的論述也在法家思想當中獨具特色；驅民于農是《商君書》重農思想的核心；強調政勝為戰勝之本是《商君書》軍事思想的重要特徵。

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
「出土文獻與《商君書》綜合研究」資助
(項目批准號：12YJCZH188)



目

次

上 冊

緒 論	1
一、《商君書》研究現狀	3
二、商鞅與《商君書》	17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28
上編 《商君書》分篇成書時代考證	31
引言 分篇考證之意義	33
第一章 商鞅生平及其思想傳承考析	35
第一節 商鞅生平考析	35
第二節 商鞅思想傳承考析	62
第二章 《商君書》分篇成書時代考證（上）	69
第一節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 《更法篇》	69
第二節 「爲國之數，務在墾草」——《墾令篇》	81
第三節 治國作壹，以農戰爲教——《農戰篇》	96
第四節 「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去彊篇》 與《說民篇》《弱民篇》	103
第五節 「任地待役之律」——《算地篇》	124
第六節 「效於今者前刑而法」——《開塞篇》	131
第三章 《商君書》分篇成書年代考證（中）	139
第一節 壹民務于農戰——《壹言篇》	139
第二節 「錯法」爲治之本——《錯法篇》	143
第三節 攻守之道——《戰法》、《立本》、《兵守》	146
第四節 任法而治，爵賞農戰——《靳令篇》	154
第五節 「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修權篇》	163
第六節 「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徠民 篇》	168
第七節 重刑厚賞、驅民于戰——《賞刑篇》	179

下 冊

第四章 《商君書》分篇成書時代考證（下）	185
第一節 「法必明，令必行」——《畫策篇》	185
第二節 武爵武任——《境內篇》	190

第三節 「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外內篇》	199
第四節 緣法而治，君尊民服——《君臣篇》	203
第五節 勢與數——《禁使篇》	208
第六節 「明君忠臣」「不可以須與忘於法」——《慎法篇》	211
第七節 「法令明則名分定」——《定分篇》	216
上編小結	225
下編 《商君書》綜合研究	231
第一章 《商君書》所見制度考析	233
第一節 「制土分民之律」——《商君書》所見土地制度考析	233
第二節 「武爵武任、粟爵粟任」——《商君書》所見爵制考析	238
第三節 《商君書》所見其他制度雜考	256
第二章 《商君書》所見思想研究（上）	265
第一節 歷史觀和人性論——《商君書》的理論基礎	265
第二節 「尚公」和國家本位——《商君書》的政治思想	275
第三節 權勢主義——《商君書》中的「勢」與「術」	279
第三章 《商君書》所見思想研究（下）	289
第一節 驅民于農——《商君書》的重農思想	289
第二節 政勝爲本——《商君書》的軍事思想	293
結語 《商君書》在戰國秦代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	301
附錄一 《商君書》佚文——《立法篇》研究	309
附錄二 商鞅大事年表	311
附錄三 大良造庶長辨析	315
參考文獻	321

緒 論

《商君書》，亦名《商君》、《商子》，舊題「商鞅撰」，漢代傳世 29 篇，今實存 24 篇。^{〔註 1〕}內容涉及商鞅及秦法家學派關於治道的理論和措施等。

自漢迄宋，學者皆視此書為先秦子書，然而其間鮮有研習此書者。宋人始懷疑該書為偽書。其後，關於《商君書》真偽之紛爭持續近千年：傳統學者大都認為是書乃先秦子書，為商鞅親著，是前期法家的代表性著作，甚至往往為回護舊說而對於其中明顯帶有戰國後期時代印迹的篇章置若未見；亦有少數學者認為此書屬雜家類著作。而那些懷疑該書各篇成書偏晚的學者，則或以偏概全，以某幾篇成書偏晚即定全書為後人偽造；或以為該書非一時、一人所為，當具體對待。當今學者普遍認為無論該書各篇成書何時，一定是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反映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及主張。在他們看來，《商君書》的成書年代似乎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這些似是而非的認識，使得今人的研究，往往明知《商君書》各篇成書時代不同，卻在具體論述時徑引原書各篇內容作為商鞅本人思想的材料，在方法上仍存在自我矛盾；也有人為避免質疑，而把《商君書》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這樣的做法較好的解決了研究方法上的弊病，但是由於《商君書》各篇成書時代不一，其中各述所聞見所主張，自然不免矛盾。因此，如何在既有成果基礎上，對《商君書》各篇逐一考證，以期對該書之成書及真偽獲得一個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認識，是我們首先試圖解決的問題。

〔註 1〕 今傳本《商君書》26 篇中第 16 篇《刑約》僅存篇名，原文已亡；第 21 篇篇名、內容俱亡；現存之《六法》篇名及內容乃後人據唐代魏徵等主編之《群書治要》卷 36 所引之《商君書·六法篇》抄錄而成，並不完整。

值得一提的是，與多數子書以闡述一己一派學術觀點為主要特色不同，傳世本《商君書》24篇體例不純，既有關於一己一派觀點之陳述，又有涉及政令、法規、制度者，並非純然的商鞅學派思想著作之集粹。前輩學者對此或在論述中各執一端，或綜論該書之思想主張，或參照此書稽考相關之制度，鮮有全面考察此書者。故欲理清眉目，最宜綜合研究。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對《商君書》全書的內容及性質有比較完整的認識，從而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做出自己的回答。

不僅如此，研究《商君書》這本體現商鞅及其後學或他人思想與治道的作品，對我們認識先秦思想學術及華夏兩千年封建制度的創立等意義重大。

在先秦思想領域，特別是戰國時期出現了諸子蜂出並作、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從對當時以及後世的影響來看，諸子當中以儒、法兩家最為突出。儒家產生最早，其學說自孔子創立，經過七十子後學、孟子至荀子幾代人的薪火相傳，儒學的發展從春秋末年一直貫穿整個戰國時期，在三百餘年間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在戰國時期即號稱「顯學」。法家的出現則是戰國時期的事情。在先秦法家思想的系統裏，商鞅和韓非子堪為傑出代表。韓非被視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作為韓非思想來源之一的商鞅自然也不容小覷。商鞅及其後學或他人所展開的關於歷史、人性、治國等問題的論述，在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獨樹一幟，研究他們的學說及其特點，無疑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戰國諸子思想的認識。

其次，就探討華夏統一國家的形成而言，制度的創立尤為關鍵。戰國時代，是其後秦、漢統一王朝所用制度的開創時期，而追尋這些制度的源流，《商君書》顯然是不能迴避的。處戰國群雄並爭之世，商鞅及其後學或他人面對紛繁複雜的內外形勢，他們是如何將其思想、主張一步步落實為制度，最終實現秦的統一的？《商君書》無疑給我們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歷史訊息。

此外，相關考古資料的相繼出土也為我們繼續研究《商君書》提供了便利。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雲夢睡虎地秦簡、雲夢龍崗秦簡、青川秦更修田律木牘、馬王堆漢墓《戰國縱橫家書》、銀雀山漢簡、張家山漢簡、湘西里耶秦簡、岳麓秦簡、北大秦簡等接連問世，這些珍貴的實物資料，極大程度地彌補了文獻不足的缺憾。

凡此種種，皆使得我們對《商君書》進行再研究存有餘地。

在進入正題之前，有必要對如下幾個問題作簡要說明：一、《商君書》研究現狀；二、商鞅及《商君書》；三、本文的研究思路與方法。

一、《商君書》研究現狀

《商君書》自成書迄今已兩千餘年，歷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頗豐，以下大致分四個方面來綜述之。

（一）《商君書》的流傳及文本的整理與研究

《商君書》自成書後因傳習夙稀，舊無善注，且訛誤滋多。經乾隆末年嚴萬里等先後校勘，始漸可讀。故此書之流傳與研究，又可以嚴萬里的《商君書新校正》〔註2〕為界，再分為前後兩大階段。

1. 流傳及沿革

《商君書》早在戰國後期即有某些篇章開始流傳於世。如《韓非子·五蠹篇》謂：「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註3〕《南面篇》曰：「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註4〕《韓非子·內儲說上》、《定法篇》等還直接引用商鞅之語，

〔註2〕我們這裡以嚴校本為界，蓋因此書實開乾嘉學者研究《商君書》風氣之先。宋刊本《商君書》到清代早已亡佚，清人所見的最早版本即嚴萬里所得之元刊本。現在最流行的《商君書》讀本即是經嚴氏校改過的元刊本。

〔註3〕「商、管之法」是否就是商君、管子之書目前仍未有定論。《五蠹篇》作於韓非入秦之前，故論述的當是韓國的情況。而秦惠王即位後，秦人婦孺皆言商君之法，可證商君之法在戰國後期流行於秦、韓等國。若將「商君之法」理解為商鞅製定的法律政令，那麼它其實也是商鞅理論的落實和寫照，故「商君之法」可以指代「商君之書」。

〔註4〕關於「內外」二字之含義，學界頗有爭議。陳啓天認為韓非子所稱的「內外」並非今本《商君書》中的《外內篇》，後者應是西漢法家者流的作品。（見其所著：《商鞅評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5月初版）而王志成則持異說，他指陳「韓非所謂：『說在商君之內外』，與今本《商君書·外內篇》不合，顯然只是單篇而已。迨至漢武帝之前，始有『書』之出現。」（見王志成：《商鞅農戰政策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號。轉引自賀凌虛《商君書今譯今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3月第1版。）陳奇猷在注解《韓非子·南面篇》該句時認為「商君之內外而鐵父，重盾而豫戒也」一句指的是《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商鞅）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這樣以來，「內外」二字又完全與《商君書》無關了。（見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37頁。）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將在後文展開論述。

據此我們雖不能像多數學者那樣斷言《商君書》已最終成書〔註5〕，但至少可以肯定其中的一些篇章在戰國後期已廣為流傳，而且一直到漢初，研習申不害、商鞅及韓非等法家學說的賢良之士仍大有人在。如漢文帝時名臣晁錯早年曾「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註6〕當時的軹縣人張恢以申、商之學授徒講學，從學者當不在少數。如東方朔盡管「直言切諫」，但商鞅學說的不見用已難逆轉。這種局面到武帝時發生較大改變，《漢書》卷六《武帝紀》建元元年（西元前140年）冬十月條云：「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這是官方公開禁止研習商鞅學說的詔令，但仍不排除有人在私下繼續為之。漢武帝時人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註7〕三國時期曹操在為政之餘亦曾研讀過商鞅的著作，如「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太祖（指曹操）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註8〕劉備遺詔後主劉禪曰：「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註9〕唐代魏徵等主編之《群書治要》亦引《商君書》相關篇目內容作為治國之參考。由此觀之，儘管在儒學居於正統地位的漢魏隋唐時期，仍有當政者重視和研讀《商君書》。

而在漢代傳世文獻中，明確提及《商君書》的有《淮南子》、《史記》及《論衡》。《淮南子·泰族訓》言及「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太史公在《史記·商君列傳》曾云：「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註10〕東漢王充

〔註5〕典型者如王曉波即據《韓非子》及《史記》的記述說：「由此可知，《商君書》之出現當在《韓非子》與《史記》之先。」（見王著：《商君與〈商君書〉的思想分析》，《大陸雜誌》，第四十九卷第一期）

〔註6〕（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袁盎晁錯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745頁。

〔註7〕（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1版，第2864頁。

〔註8〕（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一魏書一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7月第2版，第55頁，這段話是陳壽於《武帝紀》篇末所作評語。

〔註9〕（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二蜀書二先主傳，第891頁，這段話是裴松之注摘引《諸葛亮集》原文。

〔註10〕關於「開塞」、「耕戰」是否為《商君書》中之篇名，亦有不同意見。有人認

在《論衡》〔註11〕一書中多次徵引《商君書》，如《效力篇》云：「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註12〕又如《超奇篇》曰：「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商鞅相秦，致力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虞氏春秋》）。《春秋》之思，趙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註13〕《書解篇》：「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註14〕《案書篇》：「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敵。」〔註15〕

即使我們不能完全斷定以上諸書所提及之「開塞」、「耕戰」就是今本《商君書》中的《開塞》、《農戰》二篇，但仍然可以說《商君書》雖經秦末戰火，在兩漢時期還有傳本或篇章傳世。

我們今天能對《商君書》之最初篇數及商鞅的著作有確切瞭解，首先是根據《漢書·藝文志》，是篇乃班固據劉歆《七略》刪節而成，其著錄曰：

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原注：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兵權謀家：《公孫鞅》二十七篇。

農家：《神農》二十篇。（原注：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顏師古注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

由此可見，經過西漢末年劉向、歆父子兩代人的校勘、刪輯，定本的二十九篇《商君書》最終問世。商鞅還著有兵家類著作《公孫鞅》，惜後世失傳。

爲司馬遷所謂開塞、耕戰是統稱全書，而疑「太史公時《商君書》有此名」，如呂思勉的《經子解題》。也有人說司馬遷所謂開塞指今本第七篇，如紀昀等主編之《四庫提要》；所謂耕戰，指今本第三篇《農戰》，農戰即耕戰，如王時潤的《商君書斟詮》。

〔註11〕 約成書於東漢章帝元和三年（86年）。

〔註12〕 黃暉撰：《論衡校釋》（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2月第1版，第586頁。

〔註13〕 黃暉撰：《論衡校釋》（全四冊），第611～612頁。

〔註14〕 黃暉撰：《論衡校釋》（全四冊），第1153～1156頁。

〔註15〕 黃暉撰：《論衡校釋》（全四冊），第1167頁。

至於農家著作《神農》二十篇是否與商鞅有關也有待推敲，從顏注可知劉向在《別錄》中也只是懷疑而已，《別錄》一書班固一定也看過，但他仍認為是書乃諸子偽託神農而作。這就說明，將《神農》歸於商鞅名下在去古未遠的漢代就存在爭議，是不足為訓的。〔註16〕

根據傳統的目錄學著述，我們得以大致梳理《商君書》在漢以後篇卷的流傳脈絡。《隋書·經籍志》稱「《商君書》五卷」，並不言具體篇數，惟記有「或作《商子》」一句。唐人魏徵等編輯之《群書治要》卷三十六摘錄了《商君子》之《六法》、《修權》、《定分》三篇文字，其中《六法》篇今本已亡，且在《修權》篇之前。另，唐人張守節對《史記·商君列傳》中「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一句做注解時說：「《商君書》，有《農戰篇》，有《開塞篇》，五卷三十六篇。」〔註17〕按，「三十六篇」之說與漢志不合，且僅此一說，我們無從稽考，但這表明《商君書》在唐代的傳本之篇目及各篇次序可能與今本不同，而在唐代《商君書》似較為完全，未有亡缺。

五代時，後晉劉昫著《舊唐書·經籍志》及北宋宋祁、歐陽修等撰之《新唐書·藝文志》〔註18〕皆言「《商君書》五卷」，未詳其目。但從宋人私家著述中，我們發現此書之篇目至宋代始有散佚。鄭樵《通志·藝文略》說：「法家《商君書》〔註19〕五卷，秦相衛鞅撰，漢有二十九篇，今亡三篇。」〔註20〕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一亦言：「《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註21〕南宋末年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法家類」

〔註16〕《神農》一書自《隋書·經籍志》已不見著錄，可知亡佚已久。《神農》雖佚，但其言論散見於諸子典籍中，清人馬國翰所輯《神農書》一卷屬輯佚之作，乃雜採各書所引神農言論而成。據輯本可知，《神農》一書主旨在於君民並耕和重農。重農的思想實為戰國諸子之共同主張，李悝、商鞅皆有，不足為奇。然強調「君民並耕」則顯然不是法家所能贊同的。故顏師古引用劉向《別錄》的懷疑值得商榷，但如果說商鞅汲取了神農勸民農耕的思想因素應不為過，《商君書》中有多篇強調「壹民於農」即為明證。

〔註17〕此段為《正義》佚文，由學者據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及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輯錄而成。見張衍田輯校：《史記正義佚文輯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223頁。

〔註18〕《新唐書·藝文志》注曰：「商鞅。或作《商子》。」

〔註19〕宋代以來，學者多稱《商君書》為《商子》，唯鄭樵例外。自清人嚴萬里校刊本復稱《商君書》後，此一名稱又復通行至今。

〔註20〕王樹民點校、（宋）鄭樵撰：《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1月第1版，第1651頁。此書原文作「漢有十九篇」，當是遺漏了「二」字。

〔註21〕孫猛校證、（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云：「《商子》五卷，秦相衛公孫鞅撰，或稱『商君』者，其封邑也。《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一。」〔註22〕值得注意的是，《四庫全書·〈商子〉提要》的作者懷疑宋代可能有不同傳本，故各書記載所亡篇目不同。案，此說實因抄錄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之《書錄解題》誤文所致，因是說頗具權威，後人往往以訛傳訛。〔註23〕綜上所述，至南宋末年，《商君書》在私家藏書目錄中僅存二十五篇。

元代脫脫著《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商子》五卷，衛公孫鞅撰。」但未詳其篇目。清人嚴萬里《商君書新校正》目錄云：「余得元鑄本，始《更法》、止《定分》，爲篇二十六。中間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實二十四篇。與今所行范欽本正同。」〔註24〕據此似可推測《商君書》流傳到元代又遺失一篇。而明初人宋濂曾云：「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註25〕這表明，明代初年《商君書》尚有二十五篇之傳本。由此可見，《商君書》的篇目在元、明之際因傳本不同，有二十五篇和二十四篇之別，但以二十四篇本流傳更廣。此後，《商君書》的篇目未再亡缺。換言之，自元刻本以來的各本與今本篇目、內容基本上比較接近。〔註26〕

需要指出的是，從流傳過程來看，《商君書》的名稱也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在戰國秦漢時期，《商君書》被稱爲《商君》。三國時人始稱《商君書》，隋唐以後多稱《商子》，清人嚴萬里復改回舊稱《商君書》並沿用至今。

2. 傳世各版本關係

從流傳至今的版本來看，宋刊本《商君書》到清代早已亡佚。現存《商君書》的最早版本當即清代乾隆時人嚴萬里（即嚴可均）〔註27〕所得之元刊

年10月第1版，第494頁。

〔註22〕徐小蠻、顧美華點校，（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291頁。

〔註23〕詳細考證見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初印本自序》及高亨的《商君書注譯》之《商君書作者考》。

〔註24〕見嚴萬里：《商君書新校正》，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據世界書局原版重印，1996年2月第9次印刷，第2頁。

〔註25〕顧頡剛點校、（明）宋濂：《諸子辨》，北京：樸社，1926年7月初版，第29頁。

〔註26〕目前傳世《商君書》各版本第二十一篇篇目皆亡，獨綿眇閣本作御盜第二十一，有目而篇亦亡。

〔註27〕嚴可均（1762～1843），清代著名的文獻學家、藏書家。字景文，號鐵橋，烏程（今浙江吳興）人。嘉慶五年（1800年）舉人，官建德教諭。嚴氏博聞強

本。嚴氏對此本很重視，他結合明代范欽本、秦四麟本加以校正。光緒初年，浙江書局刊印《二十二子》之《商君書》用的即是嚴萬里的這個校本。現在最流行的《商君書》之底本亦多是經嚴氏校改過的元刊本。

自元刊本之後，明清以降不同《商君書》版本間的傳承關係已很難確定。但流傳較廣的幾種單行刻本與幾大叢書收錄的刻本之間尚能有明確的區分：

(1) 單行刻本。《商君書》的單行刻本有明范欽的天一閣藏本，源自元本，後為《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年間刊行的秦四麟本，被清人嚴可均選為點校《商君書》的最好版本；明鄭案本，為清人俞樾、孫星衍用於校注底本中；明馮觀評校本，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乙未刻本。

(2) 收入叢書的幾種刻本。《商君書》被收入叢書的版本分別是明馮夢禎本，收入《先秦諸子合編》，亦即綿眇閣本；吳勉學本，收入萬曆年間的《二十子》；程榮本，收入萬曆年間的《漢魏叢書》；歸有光本，收入天啓年間的《諸子彙函》；陳仁錫本，收入天啓年間的《諸子奇賞》；陳深本，收入《諸子品節》；王志遠本，收入《諸子合雅》；崇文書局本，收入光緒元年乙亥（1875 年）刻《子書百家》；朱蔚然本，收入《合眾名家批點諸子全書》；嚴可均《商君書校》，先收入《四部備要》，後收入世界書局的《諸子集成》；孫星衍、孫馮翼校《商子》，出版於孫氏刻《問經堂叢書》中；錢熙祚校《商子》先被收錄於道光年間的《指海》，後又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中。

識，精考據之學。博覽群書，一生著書不輟。早年著有《唐石經校義》、《說文聲類》、《說文校議》等，四十歲後即著作等身。後又合經史子集為《四錄堂集》1200 餘卷。最後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46 卷。《清代樸學大師傳》稱「清代著述之富，蓋無有過之者。」烏程范聲山鐫《華笑廬雜筆》卷四云：「烏程嚴鐵橋，名可均，字景文，鐵橋其號也。初名萬里，為歸安學生。乾隆末，游學京師，以宛平籍應嘉慶庚申鄉試，舉進士不第，改還本籍。」（說見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凡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1 頁。）又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八年刻《鐵橋漫稿》13 卷，其卷端下署：烏程嚴可均景文撰。據該書序文記載：「伯兄名可均，字景文，號鐵橋，姓嚴氏，烏程人。初名萬里，為歸安學生。乾隆末游學京師，以宛平籍應嘉慶庚申順天鄉試。舉進士不第，改歸本籍。」此後「嚴可均」就成了他的正式名字。由此可知，嚴萬里、嚴可均實為一人，「萬里」為其早期用名。其籍貫乃浙江烏程，因為他曾經是歸安學生，所以有時籍貫亦署為「歸安」。嘉慶五年嚴氏以宛平籍應順天鄉試，所以他有時在著作中亦署籍貫為「宛平」。歸安、烏程並屬湖州府，而湖州舊稱西吳，所以他自署籍貫為「西吳」也是對的。其早期著作，因已刻印行世，故署名仍為嚴萬里。（見曹紅軍：《「嚴可均」、「嚴萬里」辨》，《文教資料》初中版 1996 年第 6 期）

上述諸本中以嚴可均校本影響最大，該本曾先後被多個叢書翻刻收錄：清光緒年間被浙江書局刻《二十二子》收入，光緒十九年癸巳（1893 年）為上海鴻文書局石印《二十五子彙函》收錄，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 年）又被上海圖書集成局排印到《子書二十二種》中，宣統三年辛亥（1911 年）被上海育文書局石印《子書二十八種》收入。民國二年癸丑（1913 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再次收入嚴校本。民國九年庚申（1920 年）上海五鳳樓石印《子書四十八種》本時復收入。民國二十四年乙亥（1935 年）上海世界書局排印《諸子集成》本亦採之。民國二十五年丙子（1936 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縮印《四部備要》本又取嚴校本。建國後 1958 年中華書局重印《諸子集成》本亦取嚴校本。

除嚴可均校本之外，清代《商君書》還有以下幾個版本較為流行：

（1）四庫全書本。此本為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抄校。1982～1986 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大陸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1987～1989 年又加以縮印。

（2）崇文書局本（又稱子書百家本）。光緒年間湖北崇文書局刊行的「子書百家」本，《商子》在第 36 冊。

（3）四部叢刊影印天一閣本。上世紀 20～30 年代張元濟先生組織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四部叢刊》，其中所選《商君書》底本為上海涵芬樓藏明天一閣刊本。

3. 校注與訓釋

自漢以降，和《商君書》先後問世的其他法家著作如《管子》、《韓非子》早有人校正注解。與之相比，《商君書》則為世人冷落。自西漢末年劉向校定直至明代，或許受秦行法治二世而亡故事及商鞅等法家人物「天資刻薄」、「嚴而少恩」聲名的牽連，《商君書》流傳數百年而鮮有人問津。雖亦有當政者研習該書藉以總結治國之術，但並未見對其作仔細之校正、訓解者，以致傳至宋代仍有學者慨歎此書「其文煩碎不可以句，至今開卷於千載之下，猶為心目紊亂」。^{〔註 28〕}

明代以來，隨著考據學的發達，《商君書》漸從「故紙堆」走入學者的研究視野。經學者的重新校正，此書文義大體理順，勉強可讀。較早對它進行評點、校定的是明人程榮、馮觀、范欽等，他們主要是在文字方面稍加校正。

〔註 28〕黃震：《讀商子》，見《黃氏日鈔》卷五十五，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